

石志夫 周文琪 编

李德与中国革命



6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德与中国革命

(有关资料)

石志夫 周文琪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375印张 294千字
198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023-021-x/k·74

书号: 11310·70 定价: 2.45元

(国内发行)

编者说明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曾以华夫为名发表过文章。他于1932年来中国；1933年9月末，经共产国际批准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主管制定红军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以及红军的训练、后勤、组织等工作，在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他直接参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推行了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负有极其重大责任。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的错误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其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之后，他随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春，当红军即将东征之时，他曾上书中央，妄图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未逞。此后，他经组织安排，曾在抗大等单位工作。1939年离开中国。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他以写回忆录的形式，对中国革命史恣意歪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进行恶毒诽谤和攻击，企图为他在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进行辩护和翻案。

正因如此，弄清李德的问题，是研究党史、军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将初步搜集到的李德在我国的有关资料汇编成册，供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同志参考。

本书主要内容有：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关决议和文献（包括李德在华期间活动的回忆和批判）；李德在华期间发表的文章和意见书；国内外有关学者对李德问题的研究、回忆和考辨的文章。此外，我们还编写了一个李德在华活动纪事。

所收外国学者的文章中，由于作者的立场、思想观点等原

因，不同程度地有一些歪曲史实和攻击我党、诽谤毛泽东等同志的内容。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史料，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故按原文翻译、翻印，内容没有删节，望读者阅读时注意。至于李德在60年代中，发表攻击我党的文章并汇集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已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单行本，本书未予收入。

由于资料的分散和遗失，本书所汇资料很不全面，例如，有些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李德在华期间活动的回忆和批判尚未搜集到；李德在《革命与战争》上发表的《某独立师袭击敌人未成堡垒的经过（游击战术的战例）》的第一部分仍未找到；特别是对李德在抗日战争初期所发表的文章有待于进一步搜集和鉴别，等等。李德在中央根据地时发表的8篇文章，系根据石叟资料胶卷投影放大抄录。由于有些原件磨损，或因复制胶卷质量差，多处字迹模糊，图象不清。为此，我们做了若干订正工作，对文中错别字，以〔 〕标明；对漏字予以补充，以【 】标明；对难以辨认的字以□代之。此外，还对文稿上某些文句作了必要的题注和脚注。尽管如此，个别文字和示意图仍欠准确性，敬请指正。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佟英明、向青、张注洪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于智元同志在德文方面给予了大力帮助，此外还得到李定国、卢弘以及孙岩、周家珍、刘劲秋、朴惠淑、陈兆坤等同志的热情协助和鼓励；在书稿完成后，承伍修权同志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写在前面的话

伍 修 权

出版社的同志送来一部关于李德在华活动的资料，想听听我的意见。对于李德，我是比较熟悉的；有关他的这些资料，不少也曾接触过。在我们的党史军史上，李德曾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遵义会议以来对他的批评和批判，是必要和正确的。60年代他在民主德国《地平线》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文章攻击我党，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我们今天来研究李德，也应考虑其另一面，即他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当时我们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某些军事知识，对我军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中央指定他干什么，他还是干的，我还未发现过他拒不干这干那的情况。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其客观因素，即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中共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此我们都应更客观和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李德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例如李德来华前的经历，到底由谁怎样授命他来华并担任军事顾问的，他在长征后期及离华前后的活动和经历等等，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能查考清楚，对于我们党史军史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在我国已经出版了关于鲍罗庭和马林等人来华活动的资料以后，再出这样一部资料，作为典型的反面材料，我以为是必要的，这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伍修权

第一部分 决议和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3)

(1935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 (20)

(1935年2月28日)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陈 云 (24)

(1935年2月或3月)

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错误的总结

批判(摘录) (31)

(1936年12月)

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周恩来 (35)

(1943年11月27日)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 (36)

(1943年12月16日)

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节录) 朱 德 (40)

(1944年)

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提纲节录) 刘伯承 (42)

(1962年7月)

彭德怀的回忆批判 (50)

聂荣臻的回忆批判·····	(57)
王稼祥的回忆批判·····	(68)
伍修权的回忆批判·····	(69)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节录)·····	秦邦宪 (86)
(1945年5月3日)	

第二部分 李德在华期间发表的文章和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

(一)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表的文章

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	(93)
敌人的山地战术·····	(97)
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 ·····	(111)
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 ·····	(117)
再论战术原则 ·····	(122)
短促突击的战例 ·····	(126)
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 ·····	(134)
某独立师袭击敌人未成堡垒的经过(游击战术 的战例) ·····	(144)

(二) 东征前夕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

对战略的意见书 ·····	(146)
---------------	---------

(三) 抗日战争初期发表的文章

现代军事技术 ·····	(154)
坦克及与坦克斗争的方法 ·····	(159)
空军与防空 ·····	(173)
化学战争与防毒 ·····	(176)

第三部分 国内有关同志对李德问题的研究

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 ·····	伍修权 (181)
——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	

黎川事件的真相	李泽才 张 伟 (193)
——访肖劲光同志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处理福建事变中的 错误纪实	林蕴晖 (201)
——驳李德《中国纪事》中的谎言	
简论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和第五次反“围剿” 作战的失败	乌传袞 (210)
反“围剿”片断	李 基 (220)
李德进苏区实况	卓 雄 (222)
捉放李特的见闻	阎捷三 (225)
关于李德在华活动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辨 ...	卢 弘 (228)

第四部分 外国学者对李德问题的研究

那个外国智囊(摘录)	埃德加·斯诺 (245)
奥托·布劳恩	《新德意志报》记者 (248)
——一位参加过“长征”的人	
单纯防御路线	陈志让 (250)
纪念奥托·布劳恩80诞辰	A·季托夫 (260)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有关李德的 摘录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270)

第五部分 李德在华活动纪事(1932年—1939年)

(一) 李德来华前的主要活动	(303)
(二) 李德来华后的主要活动	(304)
(三) 李德离华后的主要活动	(331)

附:

(一) 李德自述	(333)
——来华前的一段经历	

(二) 李德小传	(350)
(三)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351)
(四) 关于奥托·布劳恩追悼会情况	(352)

第一部分

决议和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 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935年1月17日^①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②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

① 原有《决议》的各种文本，都在题下注“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查证，会议结束日期定1月17日。

② 在会议上做报告的是博古（即泰邦宪）同志，做副报告的是周恩来同志。在决议现存的各种版本中，这里和下文许多地方的姓名都以“××”或“×××”隐去，其中第3、4、12、14、15、16页的“××”均指博古，其他待查。

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成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

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并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

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区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的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

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

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不能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在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次“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